

1天4大赛区7场对决，“川超”首轮比赛全面开战
绿茵场上吹响城市文明“集结号”

◎ 本报记者 周洁

继9月20日2025/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川超”)揭幕战打响后,9月27日战鼓再次擂响,“川超”第一轮比赛在四大赛区全面开战。

川东赛区,广安队主场迎战达州队;川西赛区,雅安队主场迎战乐山队,攀枝花队主场迎战凉山队;川南赛区,内江队主场迎战资阳队,宜宾队主场迎战自贡队;川北赛区,甘孜队主场迎战德阳队,广元队主场迎战绵阳队。

1天之内,4大赛区,7场对决,14支市州球队热血比拼,为城市荣誉而战。14座城市以球为媒,在绿茵场上展示着不同的城市精神。当各地的文化、热情与风度等在赛场上交织碰撞,“川超”第一轮比赛揭幕战之后,再一次演绎了超越胜负的文明盛宴。

赛场上,球员们不仅展现着精湛的球技,更用一个个文明瞬间传递着体育精神——激烈拼抢中不慎撞倒对手,总会第一时间上前搀扶并致歉;竞技较量,无论比分多少,每一次攻防始终全力以赴;面对裁判的判罚,也总是理性对待,没有过激的争辩与恶意质疑,尊重裁判与对手,敬畏规则与公平;当队友打出精彩配合时,替补球员会起身欢呼呐喊;当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无论最终是胜是负,球员们都会主动走向对方阵营,握手拥抱、互相致意。赢者不骄,输者不馁,以一句“打得漂亮”肯定对手的努力;输者不馁,以一句“下次再战”传递不服输的信念。

14座参赛城市各具特色的文明风采,在“川超”的舞台上得以集中展现——雅安队传承着这座城市的红色血脉,将坚毅与担当融入赛场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抢;乐山队带着“乐善至美,创新力行”的城市精神,在赛场上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奋力拼搏;攀枝花队传承着“三线建设”的奋斗基因,每一次进攻都充满韧劲;凉山队则展现出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豪爽,球员们在赛场上活力四射,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观众……

这些不同的城市文明特质,在足球的连接下相互碰撞、彼此成就,共同勾勒出四川城市文明的多彩画卷。

赛场之外,文明风采同样无处不在。在开赛前夕,14座城市无一例外地向市民、游客发出了“文明观赛”的倡议,号召让“文明”成为赛场上最闪亮的“第12人”。各地志愿者身着统一服装,热情为观众引导座位、提供饮用水,耐心解答赛事相关问题,成为赛场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雅安雄起,欢迎乐山!”“德阳雄起,圣洁甘孜欢迎你!”“宜宾雄起,自贡雄起!”“广安达州雄起,同根同源,皆为硬汉!”……比赛看台上,“雄起”成为各地球迷最响亮的呐喊,却始终保持着对赛场秩序的敬畏——没有随意抛掷的杂物,没有过激的言语冲突,每一次欢呼都饱含着对足球的热爱,每一句“雄起”都传递着对“川超”的期许。

而当“雄起”搭配“做文明球迷为川超增彩”“为生活添彩为足球助威”等文明口号不断响起时,这份独特的观赛氛围,彰显出巴蜀大地的豪迈、热情与包容,更成为“川超”一张亮丽的“文明名片”。一声声“雄起”不仅是对体育精神的诠释,更是文明观赛的坚守。

除此之外,广元、内江等地也纷纷延续“川超”揭幕战设置“公益看台”的暖心举措,开放部分看台作为公益看台,邀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人物、新时代好少年、文明家庭以及劳动模范、行业人才、新就业群体等代表观赛,传递道德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积极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攀枝花、广安、宜宾、自贡等多地还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公园、商场等打造第二观赛区,为不能到现场观赛的球迷提供观赛便利。

比赛终于,各地球迷都会自发地将座位旁的垃圾清理带走。有人弯腰捡起散落的零食包装袋,指尖仔细捻起粘在座椅缝隙里的纸屑;有人提着自备的垃圾袋,沿着台阶逐排收纳空饮料瓶,动作轻柔却格外坚定;有家长手把手教孩子将垃圾放进垃圾袋,用实际行动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文明课”。

没有口号动员,没有专人监督,这份自发的整洁意识,恰似赛场边悄然绽放的文明之花——它比进球瞬间的欢呼更持久,比赛事结果的悬念更动人。

山西太原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启动

本报讯(薛克)9月28日,山西省太原市举行“并州有礼 文明我行”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启动仪式。

仪式现场播放了《太原市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视频,直观呈现近年来太原市公共文明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随后,正式发布本次公共文明素养提升行动的具体内容。据介绍,本次行动策划有“城市文明我来说”“城市文明我倡导”“城市文明我践行”三项核心举措,涵盖主题征文、视频海报发布,以及推动文明行为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一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多样化形式全面落实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四个行动”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

仪式最后,市民代表宣读文明倡议书,向全体市民发出践行文明行为的号召;太原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公安局等单位同步向现场市民发放了文明礼仪、文明餐桌、文明旅游、文明交通等相关宣传资料,进一步扩大行动覆盖面。

三星堆最新研究成果发布

祭祀坑埋藏年代确定为商代晚期

◎ 本报记者 刘川 罗园

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

2025三星堆论坛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2025 Sanxingdui Forum

主办单位 Hosted by: 四川省文物局 Sichuan Provinci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中共德阳市委宣传部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Deyang Municipal Committee, 中共广汉市委 The CPC Guanghan Municipal Committee
承办单位 Organized by: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Sanxingdui Institute), 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三星堆博物馆) Sanxingdui Site Management Committee (Sanxingdui Museum), 中共广汉市委宣传部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Guanghan Municipal Committee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四川大学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省考古学会 Archaeological Society of Sichuan Province
中国·四川·德阳 Deyang, Sichuan, China 2025.9

2025三星堆论坛在德阳开幕。罗园摄

9月27日,2025三星堆论坛在四川德阳举行。论坛以“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为主题,突出学术性、国际性和创新性,搭建起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交流平台。活动设开幕式暨主论坛,“文明解码”“全球对话”“文化传播”“青年创新”4个分论坛,汇聚全球专家学者,围绕三星堆考古研究成果、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公众考古与文化传播等进行交流研讨。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发布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研究的多项重要进展。除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年代、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铸造技术等备受公众关注的话题以外,三星堆遗址出土金器制作技术、铜器彩绘工艺、陶器生产标准化、水稻耕种方式、象牙保护技术等5个方面的多学科研究均有重要收获。

祭祀坑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冉宏林介绍,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研究,碳十四年代测定显示,三号、四号、六号、八号祭祀坑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相当于商代晚期。一、二、三、四、七、八号坑中发现可拼对的同一器物残片,表明埋藏年代相同。该成果为厘清祭祀坑年代和构建遗址精细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据。

“祭祀坑年代的确定对我们进一步去认识古蜀文明的演进,和华夏化的进程非常关键。”冉宏林说。

独特的“芯骨-条形芯撑”技术首次发布

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宫博

物院、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联合研究,对青铜器铸造工艺有了新的认识。研究显示,三星堆青铜器在商代晚期形成以分铸为核心,兼用浑铸、锻造的创新铸造技术体系。独特的“芯骨-条形芯撑”技术,有效解决了细长、弯曲器物的成型难题。

冉宏林举例,“芯骨-条形芯撑”技术就好比逛庙会看到的彩灯,灯的内部是有骨架的,尤其是形制越复杂、体量越大的彩灯,可能有一根主心骨,有朝各个方向的支撑。在三号祭祀坑中发现的戴尖帽立人像就使用了“芯骨-条形芯撑”技术。将这一件小的立人像进行CT扫描,就会发现内部有很明显的“芯骨-条形芯撑”技术的痕迹,包括三星堆的好几棵神树都有明确的芯骨。

“在既有技术框架中,三星堆展现出独特的技术创新与本土化表达。这一成果不仅深化了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体系的整体认知,也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及世界青铜技术与文化交流的机制提供了新证据。”冉宏林说。

三星堆彩绘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铜胎漆器”

在“文明解码”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公布了三星堆漆器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介绍,三星堆彩绘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铜胎漆器”,把过去通常认为中国彩绘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千年。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后“一醒惊天下”,当时出土的部分青铜器眼睛等处似有色彩装饰。在后来的6座祭祀坑发掘中,考古和文物保护人员结合文物保护清理进度,重新统计整理彩绘青铜器,发现仅三号祭祀坑就至少有60

件青铜器用颜料饰彩,以黑色和红色为主。据刘百舸介绍,红色多出现于青铜容器、人物服饰细密纹饰凹槽及青铜神树花瓣;黑色则多见于青铜人像、面具,用于绘制眉毛、眼睛、头发及特殊图案符号。

“三星堆彩绘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将重塑人们对三星堆文化色彩面貌的认知。三星堆青铜器的颜色,并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金色一片,而是以鲜艳的红色、金色和黑色组成的彩色。结合三星堆玉器、象牙等其他呈现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的祭祀活动,实际上,应当处于一个多彩的场景之中。”刘百舸说。

“以往认为,成都漆艺的根源在金沙遗址。”刘百舸表示,此次对三星堆彩绘青铜器工艺的新研究,将成都漆艺的源头推前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出土金器黄金用量约两公斤 中国同期文化无出其右

在“文明解码”分论坛上,著名金器保护专家,国家博物馆青铜研究所原研究员马燕如分享了三星堆金质文物的最新研究成果。据她介绍,三星堆出土金器初步统计约有两公斤,无论是黄金用量,还是金质文物制作的工艺复杂程度,三星堆的金质文物制作堪称代表了早期中国贵金属工艺的巅峰。

在三星堆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展开发掘以后,马燕如带领的“黄金团队”展开了文物保护工作。从5号坑出土时揉成一团到最后以面具的形态惊艳世人,便出自马燕如团队的手笔。截至目前,她的团队历经四年六个月的努力,考古检测、保护修复新出土的大小小金质文物已有270余件。包含金杖、戴金面具人

头像,以及金鸟形饰残片、金面具残片等。“初步统计,这些文物上的黄金用量,约两公斤,目前在国内同时期的遗址中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用金者,说明三星砂金矿源稳定。”

不仅如此,研究还显示,三星堆黄金冶炼技术娴熟,加工工艺水平遥遥领先。马燕如指出,其金质文物主要为片材应用,像金面具、鸟形饰、鱼形饰等,均以片材为基础,通过锤揲、裁切、镂刻(脱胎)造型,用刻划、篆刻手法做表面装饰,充分利用金银柔韧、延展性实现包、镶装饰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青铜器大量使用焊接技术,金器却未采用,“这足以证明古蜀人已完全了解金银材质延展性的物理特性”。

稻作农业形态为三星堆古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保障

研究还发现,三星堆遗址商代早期的古蜀先民确立了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形态,由此支撑了高密度人口,这为三星堆古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与动力。在“文明解码”分论坛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马永超介绍,古蜀先民的种稻技术,已从靠天吃饭的旱地模式,升级为精耕细作的湿地水田,为三星堆文明打下坚实的粮食基础。

此外,在掌握三星堆遗址出土象牙保存现状、病害及劣化机理的基础上,文物保护工作者还研发了现场保护技术、脱水加固技术,使出土象牙能在常规环境下保存和展示。

三星堆遗址商代晚期陶小平底罐腹和料的数量和粒径大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器身比例与口沿形态也开始呈现出较高标准化趋势。

先秦史研究专家彭邦本：三星堆和金沙体现了古蜀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本报讯(吴晓铃)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蜀地青铜文明遗存的双子星座,二者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联系?9月27日,2025三星堆论坛“文明解码”分论坛上,先秦史研究专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针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专题分享。彭邦本表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同为古蜀先民共同遗存,从宝墩文化以来就长期并存。到商周时期,相继作为古蜀文明的都邑,清晰展示了这一古老文明上承宝墩文化、下启东周后期巴蜀文化的连续性关系。

三星堆和金沙,二者的核心区仅相距三四十公里。不仅在商代作为青铜文明实体并存,进入发展的高峰期,还经历了既并存、又有政治、信仰从属关系的一体动态变迁过程。彭邦本认为,“从青铜、黄金人神造像、祭祀礼器等珍贵文物的数量和规格,特别是人(神)像等重器体量、数量的差异可知,三星堆鼎盛时期,金沙聚落是从属于以三星堆都邑为共主的古蜀王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员,也就是一个重要盟邦国。”

近年来,丰富的考古出土材料,为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支撑。

“从物质技术层面看,三星堆文化与金沙遗址显然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比如三星堆文化兴盛期,与大体并存的

十二桥金沙遗址早期的陶器,都以夹砂褐陶为主要陶系。从青铜器来看,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鸟等文物,其形制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同类器物几乎一致或甚为相似,只是形体较小。因此,《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的作者明确指出:它们之间当有着密切关联,就是早期国家礼制的统一性。”彭邦本还发现,金沙青铜遗存最早为祭祀区第二期第三段,距今约3520—3450年。而三星堆遗址最早的青铜遗存同样见于这一时期。极可能说明两者同时掌握了青铜技术,“三星堆共主一开始就与金沙遗址族群分享这一先进技术,足见两者一体统一性关系的亲近密切。从前述二者青铜器种类、形制的相同相似,尤其这些青铜器都是祭祀礼仪法器,是政治和信仰权威的标志,也足以证明二者同属于一个早期青铜文明共同体。”

从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器体量、规格的明显差异,彭邦本揭示出“三星堆古

城作为都邑,是古蜀文明共同体之之都,其共主和都邑地位显而易见;金沙遗址作为另一个大型聚落,是三星堆共主麾下的一个重要盟邦国,在西周取代三星堆成为古蜀文明的都邑。”

彭邦本认为,“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核心的古蜀王国,实行了一套统一的礼制,包括祭祀礼器、礼仪、礼容。说明古蜀文明共同体在政治统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统一整合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三星堆-金沙祭祀遗存中出土的巨量珍贵器物作为巨量财富,只有一个幅员辽阔、族群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型国家才可能聚敛、具备。



参会嘉宾体验三星堆VR奇幻之旅。罗园摄

四川大学教授李水城：三星堆金杖可能蕴含跨越万里的文化交流

本报讯(郑志浩)9月27日上午,2025三星堆论坛在德阳启动。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上,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以“三星堆出土金杖引出的问题”为主题,分享其研究成果。

权杖类文物,一般体现着权力、威仪,在中国多地和世界多地都有出土。在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中,金杖是代表性文物。李水城长期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地,搜集了世界各地出土的权杖类文物信息。他表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权杖文物对比,可以看见文化交流的影响,权杖文物可能蕴含跨越万里的文化交流。

结合考古成果和同类文物出土地点、时间线,李水城表示,权杖的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一万年。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看,权杖从罗马帝国,经过西亚一带,向东经过中亚传播至东亚,这种路径有可能存在。

与西方文明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古代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孕育、产生出一套以礼玉、青铜礼器等代表和象征权力、等级的制度。李水城认为,在已有礼玉、青铜礼器的背景下,外来的权杖作为权力象征物依然能得到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使用,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这套制度,进一步显示权威和身份。